

## 当政治极化与社会分化同行

### ——对大选年美国的初步观察

朱文莉

**内容提要：**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涌现桑德斯与特朗普两位政治新星，分别得到30岁以下接受高等教育年轻人和45—54岁高中学历以下白人男性两大群体的支持。他们意外崛起的深层原因在于近35年来美国日趋恶化的经济不平等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分化和政治极化。由于极化政治无力提供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方案，美国利用政坛边缘人物甚至社会力量寻找国家政策方向的历史传统从而再现。这两位政治人物的立场差异明显，但也存在微妙的相似之处。他们左右对峙，反而有可能为民主共和两党摆脱僵化的政策对立提供机会。

**关键词：**美国大选 经济不平等 政治极化

#### 一、扰动初选的社会力量

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总是举世瞩目，而作为总统大选的预赛阶段，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党内提名的竞争一般来说并不那么引人关注。但是2016年的初选却打破常规，从起步阶段就成为公众热议和媒体报道的焦点。以往观者寥寥的初选辩论，收视率屡创新高；各州投票进程和结果被海内外媒体密切追踪；两党的初选制度和规则突然成了美国政治学者争相讨论的课题。

毫无疑问，如此不寻常的关注度源于两党初选中都出现了打破常规的“明星级”候选人——共和党方面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民主党方面的

---

朱文莉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伯尼·桑德斯 (Bernie Sanders)。在竞选开始之前，他们都是党内甚至政坛上的边缘人物，选举前景都不被看好；而随着初选展开，他们崛起速度惊人，迅速吸引大批坚定支持者，不仅一路战胜党内知名人士，而且有效地改变了竞选辩论的主题、挑战两党的原则立场。桑德斯虽然落后于稳获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希拉里·克林顿，但其势头和影响力却更胜一筹；特朗普则已经锁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对于特朗普和桑德斯异军突起，美国各界议论纷纷，总体上忧虑多于兴奋。特别是对特朗普旋风式的胜选结果，共和党内外质疑、抨击甚至抵制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有人指责他煽动仇恨，操纵宗教和种族议题分裂社会；有人批评他毫无从政经验，缺乏明确、一致的政策主张；更有人痛斥他不尊重对手和反对者，言辞粗俗，格调卑劣，对这样一个“政坛小丑”能够接连获胜感到震惊和困惑。

应当承认，特朗普旋风的形成带有机会主义色彩。第一，共和党高层在竞选初期低估了他的潜力，打算利用他为本党吸引媒体关注，对他恶化辩论气氛的言行迟迟没有做出反应。第二，特朗普的党内对手忙于相互厮杀，特别是共和党温和派始终不能确定一致认可的代表人物，严重分散了支持力量，以至于被各个击败。第三，特朗普以商业营销式的精算抓住了共和党初选制度的要点，将人力财力集中投入实行“胜者全得”规则的几个州，尽管他的平均得票率只有41.6%<sup>1</sup>但在共和党代表大会席位上顺利确定明显领先优势。第四，以电视真人秀节目建立知名度的特朗普娴熟掌控了网络时代的媒体节奏，扬长避短，用攻击性的政治姿态压制实质政策辩论，使与他竞争的政坛老手无从发力。

尽管如此，特朗普的获胜也绝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投机取巧的结果。美国全国民调与共和党党内初选各州的选票统计分析都表明，特朗普扩大了共和党初选参与者群体，无党派独立人士、长期不参与党内活动的共和党基层党员、在某些州甚至有一些民主党党员都为了支持他而参与竞选投票，使共和党初选的投票率创下1980年以来的新高（参见图1<sup>2</sup>）。

更关键的是，特朗普吸引了一批立场坚定的核心支持者。尽管共和党高层曾明或暗地展开阻止特朗普的行动，美国主流媒体也对他密集盘问、不断发难，这些核心支持者却根本不受影响，而且明确表示不会把票投给特朗普之外的任何候选人。美国右翼学者查尔斯·默里 (Charles Murray) 称他们为“特朗普主义” (Trumpism) 的信奉者，<sup>3</sup> 他们以白人、中年、劳动阶层为主，教育程度一般在

1 统计截至2016年6月4日，<http://www.thegreenpapers.com/P16/R>, 2016-06-04。

2 Drew Desilver: “so far turnout in this years primaries rivals 2008 record”, March 8 2016,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3/08/so-far-turnout-in-this-years-primaries-rivals-2008-record> 2016-04-01。

3 美国PBS电视台对查尔斯·墨里 (Charles Murray) 的访谈: “Why economic anxiety is driving working class voters to ‘Trumpism’”, <http://www.pbs.org/newshour/bb/why-economic-anxiety-is-driving-working-class-voters-to-trumpism/>, 2016-03-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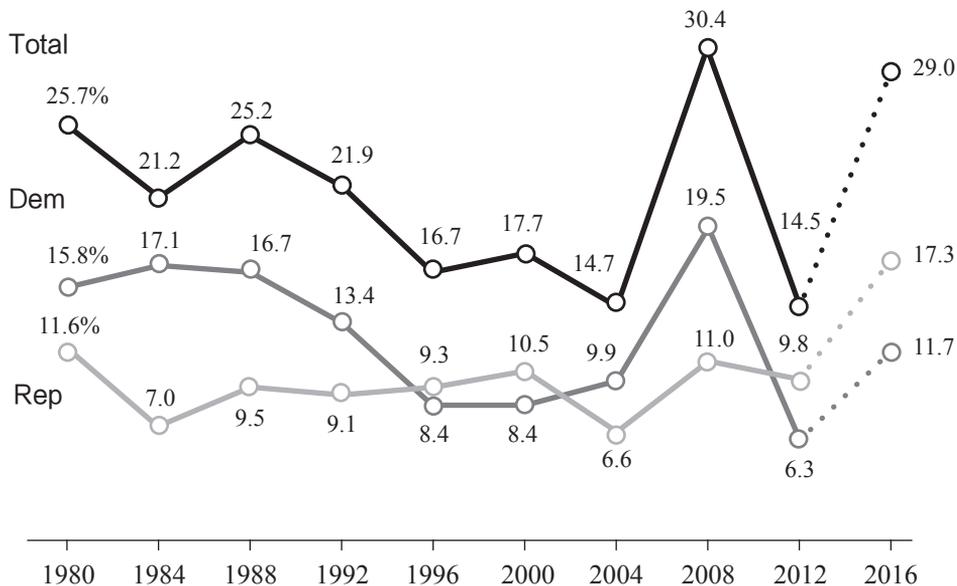


图1 1980—2016年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初选投票率：其中“Total”线显示总投票率，“Dem”线显示民主党投票率，“Rep”线显示共和党投票率。

高中以下，多集中居住在美国南部“圣经地带”和东南部阿巴拉契亚山区贫困地带。<sup>1</sup>他们对目前美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充满质疑和愤怒。在经济上，他们抱怨自己的工作机会被剥夺，认为一方面美国制造业外包导致就业岗位外流到新兴经济体，另一方面大量到来的合法及非法移民凭借低薪挤占剩余的国内工作机会。由于所在社区的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长期低迷，年龄和技能又限制了他们的流动能力，他们担心自己寻找蓝领工作进入中产阶级的渠道已经消失。更加令这些人愤怒的是，他们不仅感到经济上被抛弃，而且还自觉被文化精英轻视和压制。在谈论种族、宗教、社会、经济问题时，他们动辄被认定违背多元文化包容尊重的理念，带有歧视色彩，因政治不正确而被讥讽嘲笑甚至禁声。

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和安妮·凯斯（Anne Case）的研究，45—54岁白人人群<sup>2</sup>的长期愤懑和不满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健康状况。这两位学者2015年9月发表的报告揭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在1999—2013年期间，美国各族裔、各年龄组的死亡率都在下降，只有45—54岁白人人

1 根据密歇根州立大学“美国社区项目”组织（American Communities Project）统计，<http://www.pbs.org/newshour/bb/despair-led-stunning-hike-mortality-rates-americans/>，2016-04-01。

2 按照人类学定义，拉美裔应统计为白人。美国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习惯将拉美裔与非洲裔、亚裔合称为少数族裔，将扣除拉美裔之后的白人称为多数族裔白人。本文所称白人使用后一种定义。

群的死亡率在上升。而导致中年白人人群死亡率反常上升的，主要是其中高中学历以下的低教育程度者，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每10万人的死亡数字增加134人，而同组的大学学历和大学本科学位以上教育经历人群每10万人的死亡数字分别减少3人和57人。<sup>1</sup>

迪顿和凯斯在解读这一现象时指出，吸毒、酗酒、自杀是造成较低教育程度的中年白人死亡率增加的直接原因，也导致了他们健康程度在同一时段的下降。而这种直接和间接自杀的生活方式正反映了这一人群焦虑与痛苦的精神状态，他们属于生产率增速下滑、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经济不安全感上升的主要受害者。<sup>2</sup>而在他们承受经济压力的时候，美国决策层非但没有采取有效的扶助措施，反而通过退休金与股市挂钩等政策调整，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对未来的担忧和对传统政治过程的失望。

因而当特朗普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声称“我就是喜欢你们这些读书少的人”，保证要“从墨西哥人和中国人那里夺回工作岗位”，号召遣返全部非法移民的时候，上述人群就成为他的关键票仓。特朗普各种挑战美国既有的“政治正确”标准的言论，在引起主流社会惊诧、反感的同时，却在这部分听众当中获得强烈认同。在2016年3月共和党初选的“超级星期二”投票中，迪顿—凯斯报告认定的中年低教育程度白人死亡率最高的几个县，投票支持特朗普的选民比例也最高。<sup>3</sup>

与此相对应，民主党方面的桑德斯吸引的是另一组核心支持者——30岁以下年轻选民，特别是其中拥有以上学历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按照美国政治社会学的划分，这些人是1980—2000年间出生的所谓“Y一代”（Y Generation）的主体。他们成长于全球化时期，目睹信息技术改造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经济转型过程，深知为了面对全球竞争、跟随技术进步必须完成高等教育。而他们的大量入学恰恰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其时，联邦与地方的财政困境压缩了公立高等教育拨款，私立大学获得的财政支持同样下降，各院校的学费都在大幅度提高。这使得“Y一代”中的很多人不得不依靠助学贷款完成学业，2004—2014年美国学生贷款总额从2600亿美元增加到1.1万亿美元。<sup>4</sup>而在他们毕业之后，由于经济复苏乏力，就业市场迟迟不能回暖，寻找起步工作岗位变得异常艰难。由于面临沉重偿债压力，而又难以得到稳定的全职工作，使

---

1 Anne Case and Angus Deaton: “Rising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midlife among white non-Hispanic Americans in the 21st century”, *PNAS*, December 8 2015., Vol.112, No. 49, 15078-15083.

2 同上。

3 Edward Luce: “The New Class Warfare in America,” *The Financial Times*, March 20 2016.

4 Janet Yellen: “Perspectives on Inequality and Opportunity from th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Federal Reserve Speeches*, October 17 2014,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speech/yellen20141017a.htm>, 2016-03-01.

30岁以下年轻人群对个人发展前景普遍感到焦虑。

这些年轻人认为自己面临的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无法完全依靠个人努力来克服，政府有义务施以援手。而金融危机以来政府的表现远不能令他们满意。2008年“Y一代”中最早获得投票权的群体曾经压倒性地支持奥巴马，帮助他入主白宫。到2012年大选时，“Y一代”仍然站在奥巴马身后，但对他的支持率已经出现下滑。在今年的初选中，希拉里将自己的当选情景描述为奥巴马的“第三任期”，这已经很难再调动起这些年轻人的信心和热情。而桑德斯的及时出现，特别是他提出的全面免除公立高等教育学费、迫使银行降低学生贷款利率等主张，正是“Y一代”迫切期待的措施。桑德斯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各种计划，又使他们看到就业前景改善的希望。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桑德斯坚定的追随者，即便技术上讲桑德斯逆转战胜希拉里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他们仍然在各地的民主党竞选中为他捐款、造势、登门拉票，奋战不止。他们的表现使习惯于认定青年人普遍政治冷漠的美国政界和新闻界大感意外。

## 二、经济不平等趋势与社会阶层分化

搅动2016年大选的与其说是特朗普、桑德斯等政坛新星，不如说是被他们激发和调动的愤怒群体。这两个群体——45—54岁高中学历以下白人和30岁以下高等学历年轻人——的愤怒针对的是麻木不仁的传统政治过程，而他们愤怒的来源则是对经济不平等、社会不公正的痛切感受。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感受绝不限于上述两个群体，而是普遍存在于美国多数社会阶层。

近年来美国学术界和政策人士的研究分析表明，美国社会各阶层的感受确实反映了两极分化的经济现实。

第一，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经济不平等程度重回历史高位。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测算，1979—2007年间美国收入最高的1%家庭年收入增长了275%，所占全国总收入的比例翻番，从不到8%增加到超过17%。而中等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收入占比同期持续下降。<sup>1</sup> 经历金融危机之后，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非但没有被制止，反而进一步扩大。2013年，全美收入最高1%家庭收入占比达到了20%以上，<sup>2</sup> 高收入10%家庭收入比2010年增长2%，而其余90%家庭的实际收入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呈下滑态势。<sup>3</sup>

第二，正如知名学者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ss）所言，比收入不平等扩

1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and Federal Taxes 2007”, October 2011.

2 Emmanuel Saez & Gabriel Zucman: “Exploding 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eml.berkeley.edu/~saez/>, 2016-03-11.

3 Steven Rattner: “Inequality, Unbelievably, Gets Worse”,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7 2014.

大更令美国人难以忍受的是社会流动性的削弱乃至消逝。2015年底，美国自由派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与保守派智库企业研究所罕见地发表联合研究报告，确认社会阶层的固化趋势：43%的最低收入家庭子女和40%的最高收入家庭子女在成年后与父母所处的收入阶层相同。<sup>1</sup> 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知名学者伊曼纽尔·塞兹（Emmanuel Saez）将这种父子相承的现象称之为“出生彩票”。<sup>2</sup> 很明显，如果接受教育、勤奋工作、发挥才能这些后天努力都不能改变家庭出身决定的个人处境，那么相信个人奋斗能够带来成功的美国梦也就不复存在。

第三，经济不平等扩大与社会流动性下降又会形成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sup>3</sup> 与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尔斯·考拉克（Miles Corak）提出所谓“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The Great Gatsby Curve），以此曲线图表明社会流动性与经济不平等之间的逆相关关系。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美国1979年以来的社会流动性已经趋于最低之列。他们预言，由于过去25年间美国经济不平等程度的扩大，下一代美国人向上攀升的社会流动难度将进一步增加25%。<sup>4</sup>

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扩大与社会流动性下降形成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在经济不平等与流动性下降的双重压力下，受到冲击的绝不限于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年白人和30岁以下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两个群体。首先，至少在过去的40年里，美国的中产阶级处境困难。尽管他们通过抵押借贷、双职工工作等渠道设法追赶高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但是成功者寥寥，而跌入低收入阶层的情况却不断发生。美国著名民调机构皮尤中心将2000—2010年称为“中产阶级失去的十年”，到2011年美国中产人群占成年人口的比例从1971年的61%下降到51%，他们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则从1970年的62%下降到2011年的45%。<sup>5</sup> 其次，美国的低收入阶层步履维艰。2012年进行的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左右的美国人自认属于低收入群体，其中高达84%的低收入者在金融危机后被迫缩减生活开支，77%人表示与十年前相比他们对自己摆脱困境的期待值降低了，有接近半数的人不相信他们子女的社会地位能有所改善。<sup>6</sup> 最后，甚至最高收入10%人

1 AEI/Brookings Working Group on Poverty and Opportunity: “Opportunity, Responsibility and Security: A Consensus Plan for Reducing Poverty and Restoring the American Dream”,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and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December 2015.

2 Raj Chetty, Nathaniel Hendren, Patrick Kline, Emmanuel Saez, and Nicholas: “Is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a Land of Opportunity? Recent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NBER Working Paper No. 19844, January 2014.

3 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在2011年11月7日至2013年8月2日期间担任此职。

4 Timothy Noah: “White House: Here’s Why You Have To Care About Inequality”, *The New Republic*, January 13 2012.

5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Lost Decade of the Middle Class: Fewer, Poorer, Gloomier”, August 22 2012.

6 Rich Morin and Seth Motel: “A Third of Americans Now Say They Are in the Lower Classes”, Pew Research Center, September 10 2012.

群在持续不断的不平等分配压力下也出现了分化，只有1%最高收入家庭的收益增速不断提高，甚至收益增量的大部分又进一步集中到顶层的0.1%家庭手中。<sup>1</sup>

### 三、极化政治的困局

既然99%甚至99.9%的美国人都是经济不平等趋势的受害者，那么美国社会为什么没有形成压倒性的共识去面对这个问题、寻求缓解这一趋势的政策方案呢？原因在于美国的左右两翼对于问题产生的根源认知极端分歧，对于解决问题的原则和手段更是无法达成一致，反而随着问题的拖延和恶化相互指责，将美国政治的极化程度推向新高。

在美国的进步派人士看来，当前的经济不平等趋势始于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任内的“里根革命”。保守派右翼在大资本势力推动下以减税和放松管制为口号劫贫济富，削弱工会势力，破坏福利体系，颠覆了罗斯福新政建立的再分配制度，结果造成贫富差距再次扩大。他们呼吁：全面加强公立教育体系，保障竞争起点公平；扩大医保覆盖面，加强福利救助体系，重建社会安全网；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填平贫困阶层面临的数字鸿沟，同时提供就业岗位，提高劳动参与率；重建合理的税收制度，迫使高收入阶层和大企业承担社会责任。<sup>2</sup>

在美国的保守派人士看来，社会痛苦与经济乱象都是政府干预的恶果，联邦政府的再分配政策不但妨碍了竞争，而且造成巨额财政赤字和国债负担，扭曲了投资结构，破坏美国未来的经济地位。他们认为美国企业和个人的税负仍然过高，使它们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必须坚持里根经济学的思路，减轻企业税负、放松对它们的监管。有些右翼学者还认为不平等本身并不是问题，适当的不平等有利于刺激竞争、激励创新，通过带动经济增长而全面提升收入水平。<sup>3</sup>

双方的意见分歧如此全面和深刻，以至于缺乏沟通和对话的基础。而美国的传统政治过程不仅没有提供妥协的渠道，反而因党派政治的极化趋势陷入瘫痪，无力对经济和社会的实质问题做出回应。

---

1 Emmanuel Saez & Gabriel Zucman 前引文。

2 参见〔美〕保罗·克鲁格曼著，刘波译：《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美〕罗伯特·赖克著，石冠兰译：《超级资本主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2月版。

3 Lane Kenworthy: “Does More Equality Mean Less Economic Growth?”, December 3 2007, <http://lanekenworthy.net/2007/12/03/does-more-equality-mean-less-economic-growth>, 2016-03-20; Jared Bernstein: “Does inequality prevent economic growth?”, *Salon*, October 1 2012; “Yet Another Reason Why Thomas Piketty’s Is Wrong”, *Forbes*, June 5, 2014.

美国的两党制曾经催生了著名的中位选民理论,<sup>1</sup>即相比于多党制,两党制不易出现意识形态尖锐对立,两大党派为争取获胜必须使自己的得票极大化,因此它们习惯于尽量扩大自己的包容度和代表性,党派立场趋向多元和中庸。除了美国内战这种极其特殊的情境,两党政见总是向中间立场靠拢,既有利于政治制度的稳定,又为党派合作与妥协提供了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苏冷战的展开,美国两党的合作以外交政策领域为代表达到了空前密切的程度,出现了两党一致的融洽状态(bipartisanship)。而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党派关系出现逆转。民权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反(越南)战(争)运动相继爆发,使民主、共和两党在内外政策上分道扬镳。20世纪70年代之后新保守主义崛起,与进步左翼推崇的多元文化理念发生全面碰撞,党派斗争重新激烈起来,但跨党派合作仍然常见。

冷战终结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推动美国的党派政治进入新阶段。国际环境变化恰好与美国领导层的更新换代同步,1945年之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开始掌握最高领导权,以1992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当选总统和1994年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领导共和党夺得国会两院多数为标志,极化开始成为美国党派政治的主旋律。首先,国会中的跨党派合作逐渐减少,严格按照党派立场提案、辩论和投票成了常规。发展到现在,甚至从各个委员会中的小组委员会对于议题或法案的一读审议开始,议员就完全按党派立场站队投票,两院的党派忠诚投票比率自2010年以来一直保持在90%以上。(参见表1)

冷战结束后极化开始成为美国党派政治的主旋律且愈演愈烈。

表1 美国国会两党忠诚投票率波动区间(忠诚投票率指跟随本党多数投票的议员比例)<sup>2</sup>

时段	众议院民主党	众议院共和党	参议院民主党	参议院共和党
1971—1980	71%—76%	72%—79%	73%—76%	70%—74%
1981—1990	77%—88%	77%—79%	76%—85%	76%—83%
1991—2000	82%—92%	82%—91%	82%—91%	83%—91%
2001—2013	88%—96%	90%—95%	88%—97%	85%—94%

其次,两党温和派逐渐消失。他们在党内初选时往往因党派立场不够坚定而遭到攻击,导致选举失利或被迫提前退休。

最后,两党议员的意识形态立场日趋分化。1987—1988年的第100届国会,两党温和派的立场重合还很明显,20年后的第110届国会里,中间区域已经急剧

1 The Median Voter Model. 参见 Anthony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Harper Collins, 1957.

2 根据美国“投票观察”网站 Party Unity Scores by Chamber for All Two-Party Systems 数据统计, [http://voteview.com/Party\\_Unity.htm](http://voteview.com/Party_Unity.htm), 2016-03-31。

缩小（参见图2）。到2011—2012年间的第112届国会，几乎所有的共和党议员的意识形态评分都比任何一位民主党议员偏右，或者说几乎所有的民主党议员都比任何一位共和党同仁偏左。<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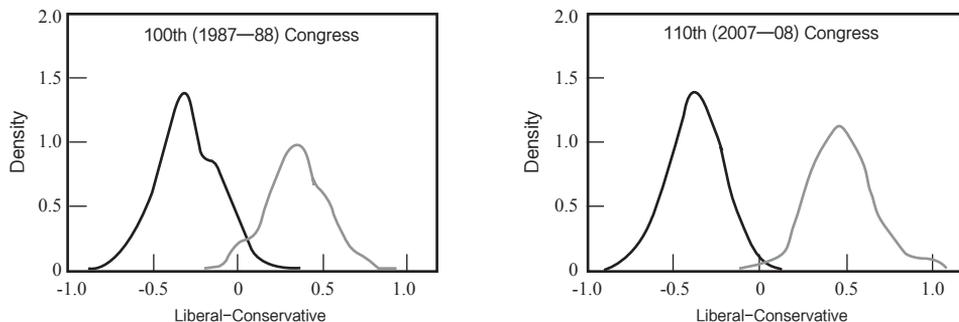


图2 美国国会左右对立的趋势（1988—2008年）<sup>2</sup>

在极化的党派政治影响下，近年来美国国会的立法、公共政策辩论和人事任命等相关议程不断出现僵局。参议院议事规则所允许的“冗长发言阻碍议事行动”（filibuster）以往相当罕见，而近年来则被越来越多地采用。1917—1968年间，历届国会因这种阻碍议事行动而引发的终结投票提案均未超过7次；而自1992年之后，每届国会的终结投票案都发生过40次以上；2008年以来的四届国会，终结投票提案更是连续超过百次。<sup>3</sup>“冗长发言阻碍议事行动”动辄被采用，已经使它脱离了保护少数派议员权力的初衷，而演变成左右两翼轮流阻止政策动议的工具，事实上，这意味着重大议案若得不到参议院超级多数支持就不能付诸表决，<sup>4</sup>以致国会运作效率日益低下。

当两党分别控制国会参众两院，或分别控制行政部门（Administration）与立法部门的时候，分裂的联邦政府导致更严重的党派对抗乃至决策过程瘫痪。总统一系列重要的公职任命提名被国会搁置审议，而国会通过的一些关键立法亦遭总统否决，国会与总统无法就联邦预算问题达成妥协，导致政府关门等各种戏剧性事件一再上演。

<sup>1</sup>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 How Increasing Ideological Uniformity and Partisan Antipathy Affect Politics, Compromise and Everyday Life”,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12 2014.

<sup>2</sup> 转引自 James A. Thomson: “A House Divided: Polarization and Its Effect on RAND”, RAND Corporation, 2010. p.21.

<sup>3</sup> 终结投票提案（cloture）是为要求 filibuster 停止而提出的动议，需得到参院五分之三多数支持方能生效。对 cloture 次数的统计依据美国参议院数据整理。United States Senate: “Senate Action on Cloture Motions”, [http://www.senate.gov/pagelayout/reference/cloture\\_motions/clotureCounts.htm](http://www.senate.gov/pagelayout/reference/cloture_motions/clotureCounts.htm), 2016-03-30.

<sup>4</sup> 美国参议院超级多数指要求进行“阻挠议事行动”议员停止冗长发言所需的五分之三多数，一般为60票。

必须指出的是，美国政治极化愈演愈烈，背后的关键推手正是近35年来的经济不平等扩大趋势。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得到公平分配，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与不同阶层之间的隔阂、猜疑，代表各阶层利益的政坛人物为维护自己的地位在国会的政策辩论中强化和固化社会分歧，党派斗争因而趋向激烈和极端，造成政治决策瘫痪。而政治和政策过程迟迟不能回应社会经济挑战，反过来又使得不平等的扩大持续蔓延恶化，形成了长期的恶性循环。由此可见，美国极化的政治和经济难题已经逐渐形成了相互强化的死结，按照传统政治模式至少是难以迅速找到解决方案的。

#### 四、边缘新人带来的政策空间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求新求变才成为美国大选年的政治潮流。当传统政治过程一再令普通民众失望，两大党派僵硬的政策套路难以松动，主流政治人物陈词滥调根本无法产生令人满意的政策效果的时候，政党乃至政坛的边缘人物才得到关注和热捧。

应该说，借助政坛边缘人物或社会力量寻求政策突破是美国政治传统中的重要特点。像今年这种新人当道的景象，在1992年大选中就曾经出现，当时独立候选人罗斯·佩罗（Ross Perot）异军突起改变两党对决的格局，而且使消除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再向前追述，1976年大选中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以华盛顿圈外人的清新形象吸引选民，成功入主白宫，使水门事件之后一落千丈的总统威信得以维持。

借助政坛边缘人物或社会力量寻求政策突破是美国政治传统中的重要特点。

如果把眼光投向更久远的美国历史，可以发现更多意涵深刻的先例。如1829—1837年间担任美国总统的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在美国政坛上被当作来自西部边疆州的新人，一度被执政党内的权贵合谋排斥。他最终在基层大众的支持下入主白宫，致力于推动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实现白人男性普选权，追求东部与西部间的地区平衡、工商业与农业之间的产业结构平衡、大金融资本与农工小业主之间的阶层平衡，对内开创了所谓杰克逊民主时期，对外塑造了被称为杰克逊主义的外交传统。正是以他倡导的政治、经济、社会平等趋势为基础，美国顺利开始了第一波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

再如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10年代活跃在美国政坛的关键人物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作为来自中西部农业州的“边缘人士”，在189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轰动一时的“黄金十字架”演说，猛烈抨击金本位制度，指责它是华尔街巨头强加给美国人的荆棘王冠，是金融资本强迫国民经济背负的十字架。布赖恩后来三次代表民主党竞争总统职位均告失利，但他的思想和言论推动了美国平民运动和进步运动的发展。这些改良运动针对“镀

金时代”遗留的经济不平等问题探索新的政策理念，提出政府监管市场、保障劳工权利、逐步建立财政再分配制度、督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等措施，拓宽了政策选择范围，缓解了美国的社会矛盾，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此外经常被提到的以政坛新人形象改变美国政治的历史人物，还包括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民粹代表休伊·朗（Huey Pierce Long），<sup>1</sup> 20世纪60—70年代的右翼民粹代表乔治·华莱士（George Corley Wallace），等等。<sup>2</sup>

可以说，本次大选中涌现的桑德斯和特朗普正是这种传统的延续。两个人的出现都激发了一些边缘群体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改变了美国底层和年轻人中间一度蔓延的政治冷漠情绪。相比之下，桑德斯牢牢抓住经济不平等这个核心问题，提出的政策主张有原则支撑，更加系统、连贯、有针对性。而特朗普更多地是利用社会分化做文章，言辞出位，主张零散，甚至不乏自相矛盾之处。

耐人寻味的是，虽然媒体经常将他们描述成美国政治光谱的两极，但两人的政策理念事实上存在微妙的相似之处。首先，他们都设法绕开两党传统的小政府、大政府争论，倡导行动政府、有效管理。桑德斯主张的医保全覆盖、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当然需要政府积极发挥作用；特朗普放言贸易管制、边界管控、迅速清偿国债，实际上也只有在政府深度介入社会经济的前提下才能成功，这与共和党固守的反对政府干预路线存在实质区别。其次，他们都支持贸易保护措施。只不过桑德斯的理由是保护劳工利益、保护环境，而特朗普更喜欢强调消除贸易赤字、重振制造业。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实行高关税或重新审查多边和双边贸易协定都与两党建制派应对贸易全球化的一贯思路相悖，当然与共和党原本奉行的自由贸易原则距离更大一些。再次，在国际安全问题上，他们都带有杰克逊主义的（Jacksonian）色彩，<sup>3</sup> 以“美国第一”为原则，既要反对损害美国安全利益的威胁坚决回击，又反对深度卷入国际事务，对承担国际义务、维持盟国间军事合作更是持疑虑态度。最后，他们都以草根民众的代表自居，严辞抨击金钱政治、大佬政治，抨击既得利益阶层。两人的竞选活动都吸引了大量分散的小额捐款，两人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接受的大机构捐款明显落后于希拉里等政坛老手（参见表2），而他们则将此作为自己的“局外人”优势大加宣扬，承诺不受既成体制羁绊，可以放手推进革新政策。

---

1 编者注：休伊·朗（Huey Pierce Long, 1893—1935），美国政治家、律师和著名演说家。他曾主要依靠美国南部贫穷白人选民支持，当选路易斯安那州州长（1928）和联邦参议员（1930）。

2 编者注：乔治·华莱士（George Corley Wallace, 1919—1998），美国政治家，曾三次当选阿拉巴马州州长（四个任期），并在1964—1976年四度参加竞选美国总统，其在1960年代坚持种族隔离立场的出格言行曾轰动全美。

3 这里指的是外交政策领域的杰克逊主义。参见〔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曹化银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261—281页。

表2 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统计的主要党派竞选人为2016年大选所筹款项数额（美元）。数据截至2016年5月23日。<sup>1</sup>

竞选人	直接筹款	各种外部组织捐款
桑德斯（民主党）	2.07亿	61万
希拉里（民主党）	2.04亿	8481万
特朗普（共和党）	5766万	329万
加里·约翰逊（自由党）	34.8万	0
吉尔·斯坦（绿党）	48.2万	0

因此，认为桑德斯与特朗普的崛起必将使两党的立场更趋极端化可能言之过早。如果说桑德斯的立场确实比民主党主流更偏左、更带有激进的进步派色彩，特朗普的政策倾向则难以以单一的意识形态标准划线。不仅如前文所述，他在政治经济问题上的言论与典型的共和党小政府主张有距离，而且他在社会文化议题上也并非简单地强化共和党右翼保守信念。虽然他蓄意挑战多元文化主义、无视政治正确标准，但是同时却对右翼保守派热衷的传统议题——如反堕胎、支持公立学校宗教活动、反对同性婚姻、坚守持枪权——缺乏兴趣，不愿意陷入这些长期争议不休的政策泥潭。从这个角度看，两位搅动初选的新星不受惯常的党派立场表达束缚，重新选择议题重点，不断提出前所未闻的施政口号（如特朗普一度提出在八年内完全偿付美国累积超过19万亿美元的长期国债，桑德斯主张完全免除公立高校学费），将两党的政策边界冲击得破碎零乱，这样反倒可能为它们提供机会和空间，可以借此摆脱僵化的原则分歧、立场对峙、政策对抗，寻找新的政策组合。

## 结 语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2016大选年的社会政治生态是西方发达国家乃至世界政治潮流的一个缩影。1990—2010年代高速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严重经济不平等问题久拖不决，造成社会分化和政治不满情绪的积累。<sup>2</sup> 在今后的全球化阶段，世界经济可能相对增长缓慢、甚至陷入长期停滞，<sup>3</sup> 公正分配取代高速扩张成为

1 美国专门研究金钱政治的智库“政治回应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公布的数据，见：“2016 Presidential Race”，OpenSecrets.org，<http://www.opensecrets.org/pres16/>，2016-06-15。

2 Paul Krugman: “Hyper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Inequality”，<http://krugman.blogs.nytimes.com/2015/11/30/hyperglobalization-and-global-inequality/>，2016-03-15。

3 相关讨论参见 Lawrence H. Summers: “The Age of Secular Stagnation”，*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16。

各国社会经济政策的主题。如何调整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凝聚各阶层都能接受的社会共识、优化全球治理规则，自然成为公共政策讨论的焦点。当传统政治过程对现实问题不能做出及时、恰当回应的时候，当下层民众对既得利益体制失去信任的时候，选民转向边缘人物寻求答案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凡是能够将这些探索

**能够将改革的探索转化为制度和政策活力的国家，有机会引领世界潮流。**

转化成制度和政策活力的国家，就有机会引领世界潮流；因极端声音出现导致国内混乱蔓延的国家，则有可能影响世界秩序的稳定。这些变化未必一定因选举而起，更不一定随选举结束而终，但却是决定未来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